

# 劉成禺與全編本《世載堂雜憶》

## 「開卷有得」之四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劉成禺（1875—1952），本名問堯，字禹生，筆名壯夫、漢公、劉漢，湖北武昌人。1875年生於廣東番禺，故字禹生，以面略麻，人以「麻哥」稱之，亦不以爲忤。有李根源，雲南騰衝人，人稱爲「李麻子」。民國初年，劉、李等人同遊蘇州，恰好遇著了章太炎，便相約到一家照相館去照相。排坐位時，章太炎居中而坐，他令李根源居右，劉成禺居左。這時劉成禺有意見了，他悻悻地說：「我是麻哥，他是麻子，子焉能居哥之上？」章命劉、李换位，劉成禺才不再嘮叨，自覺「麻哥」到底略高「麻子」一籌。1944年春間，太炎先生已去世多年，李根源到陪都重慶，寫了許多詩，中有〈訪劉成禺七星崗蔭廬戲贈〉詩云：

我是騰衝李麻子，君是江夏劉麻哥。

回首吳門合夥事，太炎不見奈之何！

劉成禺出生於官宦之家，其父劉兆霖號雨臣，曾在廣東廣州府和潮州府等地爲官數十年，「卓著勳聲」。成禺幼長於粵，後入武昌經心書院、兩湖書院學習，受教於梁鼎芬，後又曾跟隨辜鴻銘和容閱學習西文。1901年，以唐才常案被累，離鄂走上海，館於王培生家。王家富藏書，得以博覽群籍。後應陳少白之招，與沈翔雲至香港，又以少白之介，加入興中會。同年入日本成城陸軍預備學校，1902年，經程家怪介紹在橫濱與孫中山相見，縱談竟日。後來他回憶說，此次會見，「是爲四十餘年致力革命之發軔」。同年孫中山曾對他說：「吾欲子搜羅遺聞，撰著成書，以《滿清紀事》爲基本，再參以歐美人所著史籍，發揚先烈，用昭信史，爲今日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亦犬養先生意也。吾子深明漢學，能著此書，吾黨目下尚無他人，故以授子。」於是劉成禺在1903年寫成《太平天國戰史》書稿十六卷，1904年先印行六卷，孫中山爲之作序。1903年1月，劉成禺與湖北革命志士藍天蔚、張繼煦、李書城等在東京創辦了《湖北學生界》。劉成禺曾在刊物上發表〈史學廣義〉一文，宣傳了民主革命思想和推翻清王朝的思想。由於這份刊物，使劉成禺失去了官費留學生資格，不能繼續在日本停留。而孫中山在自傳中也說：「劉成禺在學生新軍大會，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1904年春，孫中山抵舊金山，與保皇黨論戰，改組洪門致公堂機關報《大同日報》，掃除保皇黨勢力；此時劉成禺也離日赴美，入加州大學攻讀，以馮自由之薦，課餘兼《大同日報》總編輯。馮自由說：「自是大倡革命排滿，放言無忌，每週華僑革命思想之激盪，劉之力爲多焉。」從東京到舊金山這段期



間，劉成禺可說是孫中山不可多得的戰友。

劉成禺爲了更快適應語言環境並完成學業，他找了一位小他兩歲的美國白人姑娘名叫珍妮·艾拉·特雷斯科特（Jennie Ella Trescott）任英文教師。據其好友楊千里說，珍妮住在他寓所附近的一所樓房，某日，她的寓所三樓失火，看看快要延燒到她所住的五樓了。珍妮的母親見女兒困在五樓，就大叫：「我的女兒在五樓啊！」劉成禺在人叢中聽到叫聲，立即冒險衝上五樓，把珍妮背下來。珍妮深感救命之恩，雖然在美國大部分地區包括加州，法律明確規定白人不能與華人通婚，但珍妮決定要嫁給劉成禺。楊千里後來爲他刻一「火裏奇緣」印署相贈。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也曾回憶說：「四十年前，與予妻（Dolly Tiscott）結婚於渥陽明州（案：今譯為懷俄明州），該州無禁止東方人種與西女結婚條例，地近優脫州（案：今譯為猶他州），乃為鹽湖之遊。鹽湖城，為優脫首府，在萬山之中，人富膏原，家無陋屋。」

1911年武昌首義成功，不久，劉成禺回國，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參議院湖北省參議員。南北議和期間人事都由黃興裁定，劉成禺因不滿黃興而與孫武合作，在上海成立民社，與同盟會公開對立。從支持孫中山變爲反對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這大概是彼此始料未及的。不久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臨時政府北遷，劉成禺北上任參議院參議員。當時袁世凱極力籠絡，曾以大總統令頒授「嘉禾章」一枚，希望他改弦易轍，歸其所用。但劉成禺虛與周旋，堅守革命初衷不變。「二次革命」起，他與國民黨籍國會議員多人，被誣犯內亂罪，被袁世凱下令通緝，於是被迫逃到上海，開一雜貨鋪營生，鋪掛招牌爲「嘉禾居」，並將「嘉禾章」嵌於招牌中，有人勸止：「此爲肇禍之根，恐遭不測！」劉成禺厲聲曰：「袁早晚必敗，不過塚中枯骨，我何懼哉？」。1916年袁世凱死後，經過五年左右的疏離，劉成禺繼續追隨孫中山。1917年8月，被任命爲廣州國會非常會議參議院議員，9月被任命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府顧問。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劉成禺被任命爲總統府宣傳局主任。1923年3月，孫中山又任命劉成禺爲陸海軍大本營參議。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孫中山受邀北上，此時段祺瑞已就任臨時執政府執政，孫段之間已無合作基礎可言。於是孫中山下令北上的國民黨員不得在北京政府任職，劉成禺與郭泰祺遵從孫中山的臨終教誨，二人一起回武昌，劉成禺任教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一直到1931年。1931年春，國民政府任命劉成禺爲監察院監察委員，一直任到1947年。1947年8月，劉成禺被派爲監察院兩廣監察使。1949年初，他被任命爲國史館總編修。中共建國後，他返回故鄉武昌，曾任湖北省人大會代表、湖北省人委會參事，1950年8月被任命爲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1952年3月15日病逝於漢口，享年七十八歲。

劉成禺在青年時代，雄健有力，前在哥老會中，充白紙扇（軍師），他並不自諱，即在《世載堂雜憶》中，亦曾透露。辛亥革命，南北議和，他充南方代表，亦虎虎有生氣，當時有人呼之爲劉大炮者。北伐以後，組織南京政府，于右任拉他爲監察院首席監察委員，不免漸呈暮

氣，當時他說：監察院「不打老虎，只拍蒼蠅」，雖然以幽默的語調出之，但遇事頗小心謹慎也，且精神亦不及前。國民政府每遇星期一，做紀念週，讀孫中山遺囑，然後此臨時主席演說一番，各屬員則環而恭聽，皆鵠立無座位也。監察院亦如之，一次，于院長方操其陝西官話，作冗長的演說，忽聞鼾聲起於群列，視之，則劉成禹也。幸有立於其傍者推之，曰：「站著亦能打鼾嗎？」他低聲道：「此種話聽之令人昏昏欲睡耳。」

劉成禹喜愛打牌，無論在北京做議員，在廣州當總統府高等顧問，在南京當監察委員，甚至抗戰期間，重慶市禁止打牌，他還是天天在家裡召集朋友攻打四方城，霹靂拍拍，聲震四鄰。警察局長徐中齊不敢惹他，派員婉勸他在檯面鋪布，免得引起鄰舍反感，他也置之不理。他生平的嗜好，除了打牌之外，就是聊天。他和朋友聊天，古今中外，誇誇其談，尤其是對前清遺老、北洋官僚、黨國要人的拆爛污醜聞秘事，更是葷素並進有聲有色的給以廣播。「天下的好話，由他說盡；天下的壞事，由他做盡。」就是當年他給某人所下的判詞，傳誦一時的名句。

與劉成禹有過接觸的香港掌故家高伯雨說：「劉麻哥是政客中而帶有書生氣味的人，為人趣味可近，和他交往，久之而覺得其人可愛，他一方面從政，一方面又熱心著述，生平寫過好幾種書，……這些作品，不用說是敘述了不少珍貴的史料。」劉成禹的著作共有：《先總理舊德錄》、《中國五大外交學者口授錄》（五人為容閔、馬相伯、辜鴻銘、伍廷芳、唐紹儀）、《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世載堂詩》（六卷）、《散原先生松門說詩》、《太平天國戰史》（十六卷）、《史學廣義》、《廣西史考廣義》（四卷）、《自傳》、《禹生四唱》（包括洪憲紀事詩、金陵新咏、憶江南雜詩、渝州雜咏、論版本絕句）、《世載堂雜憶》等十一部著作。

其中《世載堂雜憶》大部分是劉成禹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的筆記體史料，以隨筆記錄為主，體例不拘。他在七十歲時預知他還有十年壽命，於是日書《雜憶》數則，又把他「平生首尾未完畢之書，如《禹生四唱》、《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憶江南雜詩注》、《容閔、辜湯生、馬相伯、伍廷芳外交口授錄》、《世載堂筆記》與《自傳》等，盡歸《雜憶》中，匯為長篇，備事分錄。」於是從1946年9月15日開始在上海《新聞報》副刊《新園林》刊登，「年餘始畢，風靡一時。」掌故大家鄭逸梅就說：「《雜憶》可與汪東之《寄庵隨筆》銖兩相稱，洵為兩大力作。」由於劉成禹生平交友廣泛，當時的上層人物如孫中山、黎元洪、伍廷芳、章太炎、鄒容、蔡鍔、楊度、胡景翼等，無不與他過從甚密，所以他的著作內容廣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他自己評價說：「典章文物之考證，地方文獻之叢存，師友名輩之遺聞，達士美人之韻事，雖未循纂著宏例，而短篇簿錄，亦足供大雅諮詢。」

《世載堂雜憶》收錄的文章，記載了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人物事蹟、政治制度、社會變革等等，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生著千百年來沒有過的巨變，政治腐敗，列強橫行，國勢衰微，社會動盪不定，文化眾聲喧嘩。本書記錄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教育以及人物等多方面，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民國史的重要資料。雖然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中，指出劉成禹寫作



態度不夠認真，如說：「禹生游談之雄，好為捕風捉影之說，譏訕前輩，自是一病。」又說：「禹生以小說家姿態，描畫先烈成書次第，故事隨意出入，資其裝點，余殊不取。」確實該書在某些考證上，常有疏忽，後人使用此資料時，是不可不辨者。然瑕不掩瑜，此書還是包含許多珍貴的資料。董必武為《世載堂雜憶》題詞中就提到：「禹生見聞廣博，晚年憶其從前耳濡目染之事，筆而錄之，為《世載堂雜憶》。此隨筆之類，未加整理，雖不無耳食之談，謬悠之說，然多遺聞佚事，其中亦有《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之所未及者，甚可喜亦可觀也。」

《世載堂雜憶》在劉成禺生前並無單行本印行，此書稿後來由錢實甫整理，1960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收為「近代史料筆記叢刊」之一種。1971年臺北文海出版社也出版，收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一種。1976年臺北長歌出版社也出版，收為「長歌傳記文學叢刊」之一種。199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也出版，收為「民國筆記小說大觀」之一種。1997年遼寧教育出版社也出版，收為「新世紀萬有文庫」之一種。然這些版本完全根據1960年的中華書局版。但當時錢實甫在整理編輯此書時，可能有他的取捨標準，因此有許多文稿並沒有編入。1966年雋君（筆名）就說：「但是該書印行的，只有十分之八的材料，還有部分文稿，沒有編入。我手邊藏存他的餘稿，今特整理抄錄，並略為注明。目的是供讀者得窺全豹，也可以使作者當年的寫作，不致四分五裂而有遺珠之憾。」雋君整理的文稿名為〈世載堂雜憶續編〉，後來在高伯雨創辦的《大華》半月刊第25期（1967年3月15日出版）開始連載，分10期刊畢，共有27篇。分別是〈王壬秋的三女〉、〈可憐秋水詞〉、〈梁啟超兩女友〉、〈陳友仁黑白分明〉、〈萊州奇案〉、〈諧聯拾雋〉、〈多妻教與多妻制〉、〈美國兩大奇案〉、〈楊守敬瑣事〉、〈官文寵妾壓群僚〉、〈沈佩貞情賺黎元洪〉、〈唐群英侮辱宋教仁〉、〈留東外史續編材料〉、〈英雄大鬧參議院的一幕〉、〈讀書拾雋〉、〈溪山如意伴梅花〉、〈散原老人遺事〉、〈沈葆楨與其師〉、〈迎得新人，忽來「魔鬼」〉、〈李鴻章向子作揖〉、〈千古傷心搵淚巾〉、〈讀書小識〉、〈粵謳作者招子庸〉、〈左宗棠因聯逢知己〉、〈李鴻章幕中壞員〉、〈滄桑歷劫紀南園〉、〈曾國藩瑣事〉。這《續編》下署「劉禹生遺著，雋君注釋」。雋君並對文中的人物別號事蹟加以註解，讓讀者免去查考之煩，此非精通清末民初之史事者，不易為也。我一度猜想是高伯雨本人，今看牛津版高伯雨《聽雨樓隨筆·六》，方知是陸丹林也。

陸丹林（1896-1972），字自在，號非素，齋名紅樹室，廣東三水人。陸丹林廣額長臉，身材瘦長。據鄭逸梅說他一目失明，以盜目代之，宛如天成，人罕知之。他一足微跛，係早年遇盜，他大膽抵抗，為盜開槍所傷。幼年就讀於家鄉達立學堂，因在祭孔時拒絕充當陪祭並反對行禮，被校方記大過一次。後入廣州朱執信校長培英學校。1911年黃花崗之役前夕，加入同盟會，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一些國民黨中「元老」級的政治人物，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從政經歷，1918年，任職廣州軍政府。他學西醫一年多，後來到上海，住中國寰球學生會宿舍，得識該會主幹事朱少屏，並由其介紹加入南社。並開始從事報刊編輯，先後曾主編許多報刊雜誌。



尤其以文史和書畫刊物而聞名，堪稱是當年國內和港澳兩地的第一「名編」。

陸丹林主編的刊物，有《人之初》、《中國晚報》、《大光報》、《國畫月刊》、《蜜蜂畫刊》、《廣東文物》、《道路月刊》等刊物。但其中為人們耳熟能詳並津津樂道的是《逸經》和《大風》。《逸經》，1936年在上海創刊，是半月刊的文史雜誌。簡又文任社長，由謝興堯任主編，社址在滬西愚園路的愚谷邨。1936年底，謝興堯以體弱多病，加上不習慣上海的生活，編輯工作的繁劇，而辭職北上，所以從第22期起，由陸丹林繼任主編。陸氏乃將內容大加調整，如「逸經」、「文學」、「建國史實」、「今代史料」、「太平文獻」、「藝林」、「考據」、「詩詞」、「人志」、「特寫」、「紀遊」、「小說」、「掌故」、「秘聞」、「史乘」等。撰稿人有俞平伯、周作人、葉恭綽、陳子展、謝國禎、王重民、柳亞子、胡寄塵、郁達夫、林語堂、宋春舫、趙景深、瞿兌之、金息侯、徐一士、徐蔚南、謝冰瑩、李青匡等，均一時名作家。還有馮自由與劉禹生，也是《逸經》的臺柱。馮自由根據他自身的經歷與見聞及其在民初「稽勳局」局長任內而彙集的資料，分段寫成《革命逸史》。劉禹生曾為兩廣監察使，每期寫《洪憲紀事詩本事注》，每事作七絕詩一首，加以註釋，並附有圖片，專記袁世凱竊國稱帝事。馮、劉之文，先在《逸經》連載，後來才刊行單行本的。

鄭逸梅說陸丹林對於名作家特別尊重，如周作人要求保留原稿，不得沾污，陸丹林特委事務人員為之謄鈔，以副本發排，原稿奉還。且凡名作家，每篇刊出，將該文多印二十份，寄給作者，俾作者保存。續有所作，即續為複印，積多了，裝訂一下，儼然為一單行本，這個辦法很博得作者的歡迎。

《逸經》在宣傳抗日，曾與《宇宙風》、《西風》聯合出刊了《宇宙風·逸經·西風非常時期聯合旬刊》。之後迫於形勢，這幾個雜誌的骨幹成員，又避聚香港，於1938年3月5日共同創辦了《大風》雜誌（初為旬刊，第72期改為半月刊），由著名作家簡又文和林語堂任「大風社」社長，陶亢德和陸丹林任編輯。夏曼（陶亢德）在〈香港的雜誌〉文中說：「香港之有『海派』雜誌，恐怕要推宇宙風逸經社合辦的《大風》為開山祖了。……簡君舉家遷港，烽火漫天，而辦雜誌之心不死，函邀《逸經》編輯陸丹林君去港，並請宇宙風社合作，於是一陣大風，遂起於香港。」《大風》為抗戰期間在「精神上智識上」感到貧乏的讀者，提供文化滋養和精神食糧。內容方面，「為適應時勢之需求」，故「由一元而演為多元」，其中包括文藝創作、書評、譯文、專著、史實掌故、各地通訊、漫畫等。但從第10期開始陶亢德和林語堂的名字就從編輯名單消失了。

《大風》最為人所知曉的是在1939年3月5日第30期刊出郁達夫的《毀家詩紀》，全組詩共二十首，其中七絕七首、七律十二首、詞一闕。這些詩詞當是郁達夫1936年春至1938年冬陸續寫成，並經多次修改，最後加上注文，每首詩後注文詳細記述他與王映霞婚變的過程，淒惻動人。王映霞以詆語太多，心不甘服，也如法炮製，做了許多詩，附有注釋，反唇相譏，交



給陸丹林發表，那就是刊於第 34 期的〈一封長信的開始〉。只是陸丹林覺得太失達夫面子，便僅登了詩，注釋都被刪掉，王映霞對此認為厚此薄彼，有失公允，頗不以陸丹林為然。

陸丹林性情不隨流俗，做事往往與眾不同，個性獨特，好惡分明。據鄭逸梅回憶，陸丹林死前數月預寫遺囑，別具一格，說：「我離世後，遺體送殯儀館，不要再穿衣服，也不要整容，這是愚蠢人所做的笨事，切勿盲從，否則是糟掉物料，對死者無補，對生者有損。遺體送到殯儀館，自行結帳，定於何時火葬，不必管它。這樣做得灑脫，省卻許多無聊瑣事。骨灰不要取回，交托殯儀館即可。因為它沒有一些用處，反成累贅的廢物。」

由於陸丹林經歷變革時代、又與革命人物多有往還，近水樓臺，收集當時資料以及文獻，故得以造就相關著述亦豐，著有《革命史譚》、《革命史話》、《當代人物誌》、《從興中會組織到國共合作史料》（據鄭逸梅說，該書稿約二十萬言，其中頗多珍聞秘事，外間從未發表，材料十之七八，是由陳少白、于右任、譚延闓、徐季龍、汪精衛、唐紹儀、馬君武、馮自由、居正、葉恭綽、鄒魯等口述，由他筆錄，惜乎沒有刊成，稿都散失了。）、「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孫中山在香港》、《美術史話》、《紅樹室筆記》、《楓園瑣談》等，其他散見於各報刊的文章甚多，十之八九為文史資料。

後來《大華》半月刊在登完不久，就因財務虧損而停刊了。這份印量不多的雜誌因在香港出版，當時海峽兩岸甚少人注意到，因此儘管它早在 1967 年就已刊出中華書局失收的〈續篇〉，但在這之後兩岸出版的四種版本，竟無任何一個版本收入這〈續篇〉。高伯雨說當年香港有位喜歡翻印書的朋友找他商量，要就《大華》所登的《世載堂雜憶續編》排印出版單本，他也竭力贊成，但終究未果。

如今《大華》半月刊早已成為絕版的雜誌，甚至連知名的圖書館都沒有收藏，筆者偶然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找到後來香港龍門書店複刻的四十二期《大華》雜誌，於是把連載十期的〈世載堂雜憶續篇〉27 篇文稿影印，2010 年，我就《續編》重新排版，補入原有的書稿之後，成為「全編本」《世載堂雜憶》（秀威資訊出版），如此讀者當可得窺全豹，而無遺珠之憾矣。只因劉成禺、陸丹林、高伯雨都是我敬佩的作家，因而成就此一段因緣。 ISBN

### 延伸閱讀

- 劉成禺著；蔡登山輯（2010 年 9 月）。世載堂雜憶（全編本）。臺北市：秀威資訊。